

财政透明、FDI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储德银, 姜春娜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财政透明作为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内在诉求与制度基础, 不仅能够通过促进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行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且能够通过优化外来投资者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增强地方政府对于 FDI 的吸引力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 诠释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提出研究假设。其次, 通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 3SLS 估计实证考察财政透明与 FDI 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呈负向抑制效应, 而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异质性。最后, 通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进一步考察发现: 财政透明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双重作用机制, 即财政透明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地方经济增长质量, 还可以通过促进 FDI 流入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 FDI 在发达地区能显著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但在欠发达地区反而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产生抑制作用。

关键词: 财政透明; FDI; 经济增长质量; 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2)04-0011-12

Fiscal Transparency, FDI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HU Deyin, JIANG Chunna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UFE,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perfecting modern fiscal system, fiscal transparency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so that it can directly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it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achieve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o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ttra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FDI. This paper firstly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the multiple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fiscal transparency and FDI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en this paper builds a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and adopts 3SLS estimation metho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and it is found that fiscal transparency will imped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impact of FDI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fter that, standardization regression of the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is conducted to make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fiscal transparenc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wo

收稿日期: 2021-12-20 修回日期: 2022-0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激励机制重构问题研究”(19FJB035); 安徽省人文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财政透明、支出结构优化与地方政府治理”(AHSKZ2019D01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制结构优化与改革研究”(21&ZD096)。

作者简介: 储德银(1976—), 男, 安徽岳西人,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体制改革。通信作者: 姜春娜。

channels. That means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effect, fiscal transparency can also affec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by attracting more FDI inflows. On the other hand, FDI inflows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while FDI inflows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in less-developed regions.

Key words: fiscal transparency; FDI;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当前要立足新发展格局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大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促进全民共享改革成果^[1]。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指出要完善政府职能与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切实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进而凸显政府职能的科学界定及其有效运行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斯蒂格利茨(2007)^[3]认为由于任何组织,包括公共部门都会因不完美信息而导致代理问题,唯有在充分了解内情的前提下对政策进行讨论,政府才有可能实现有效治理,因而透明化和公开化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近年来,财政透明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倍受关注。财政透明是指对广大公众尽可能及时、全面、清晰、准确地公开政府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意图、公共部门账户的历史信息以及预测信息^[4]。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不仅将公开透明作为各级政府预算编制执行的基本准则,而且还使得财政信息公开在我国有法可依与有据可循。在这之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19年5月13日起正式施行,明确“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这一基本原则,则进一步保障我国社会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为此,本文尝试将财政透明、FDI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置于同一理论分析框架,深入探究财政透明与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从而为新时代我国政府如何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研判视角和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

自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面对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

增长普遍趋缓与逆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如何更好地发挥FDI对企业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的促进作用,对新时代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愈来愈受到该国制度质量的影响,而财政透明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基础,不仅能促进政府的廉洁高效与提升政府公信力,还能从多维度改善外国投资者面临的制度环境,这对一国政府吸引FDI流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财政信息公开及其透明程度倍受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财政透明与政府行为之间关系从不同维度展开深入研究。一是财政透明与腐败治理。在公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中,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政府存在寻租空间,而财政透明能够缓解公民作为委托人所面临的信息劣势,从而通过增加官员腐败成本与风险有效抑制腐败^[5]。Alt等(2003)^[6]通过分析美国各州数据发现,财政透明与腐败程度之间呈负向相关关系,即提升财政透明能够有效抑制腐败。随后,De等(2017)^[7]的经验研究亦支持这一结论。二是财政透明与公共支出效率。Graaf(2007)^[8]认为政治激励机制在缺乏财政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官员此时缺乏动力提高公共支出效率,通常会采取扩大收支规模的方式提升居民公共福利,而财政透明能够促使政府官员对公共支出决策更加负责以及由此提升公共支出效率^[9]。Montes等(2019)^[10]采取包含8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考察财政透明与公共支出效率之间关系时发现,财政透明对公共支出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与之相对,国内外学者围绕财政透明对FDI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相对甚少,且多是将两者分隔进行研究。一方面,针对财政透明与FDI之

间关系, Lorenzo 等(2020)^[11]利用 2006—2015 年间 7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 财政透明能够吸引 FDI 流入; 另一方面, 有关财政透明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Kaufman 等(1997)^[12]认为财政透明能够增强政府公信力^[13], 而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张树剑(2016)^[14]以我国 1985—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例实证考察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影响, 发现虽然财政透明度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呈边际递减趋势。

综上所述可知, 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维度针对财政透明与 FDI 的经济社会效应展开了深入研究, 但鲜有学者将财政透明、FDI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系统探究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作用机制及其影响效应。正因如此, 本文与已有研究相比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试图从理论层面将财政透明、FDI 与经济增长质量置于同一分析框架, 系统阐述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多重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二是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 3SLS 估计实证考察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渠道。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作用机制

1. 财政透明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正向促进机制

第一, 财政透明有利于抑制公共支出规模不合理扩张^[15], 进而通过提升公共支出规模效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财政透明不仅能够缓解上下级政府之间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通过加强内外部监督有效抑制资金使用部门的寻租腐败与减少财政资金的无谓损失, 还能通过向立法机关和公众提供关于公共部门绩效的相关信息促进公共行政效率提升, 以及通过增强社会公众严控公共支出意愿抑制公共支出规模不合理扩张。

第二, 财政透明有利于促进公共支出结构优化^[16], 进而通过提升公共支出结构效率优化社会

资源配置, 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财政透明能够促进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和作为代理人的政府之间信息的良性互动, 促使公民通过“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倒逼地方政府将公共支出向民生性领域倾斜的同时, 减少决策者失误导致的支出偏误, 从而促使政府支出结构的优化。

第三, 财政透明能够通过增强政府公信力更好发挥其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 进而通过优化社会投资结构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众所周知, 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社会投资结构并非能达到社会总体福利的最佳状态, 如科技、环保等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或外部性强的领域, 其投入往往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对这些领域进行直接投资以弥补其不足的同时亦能通过公共资本撬动民间资本, 而财政透明能够通过显示公共资本的良好运作而增强政府公信力, 进而实现政府对私人投资的积极引导。

第四, 财政透明能够通过提升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的预判能力缓解经济波动, 进而通过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财政透明能够促进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通过为微观主体提供更准确及时的政府活动信息而披露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方向和程度。微观主体能够据此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更为准确的预判, 使其经济决策更为科学, 这不仅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优化, 而且能减少经济不必要的波动, 通过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2. 财政透明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负向阻滞机制

一方面, 财政透明会因对政府不规范行为的过度曝光而损害政府公信力, 从长期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政府公信力丧失不仅会严重影响政府对私人投资的积极引导, 进而阻碍社会投资结构的优化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亦会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影响经济稳定运行。譬如由于政府公信力的丧失, 公众对于经济的稳定性会持消极预期, 公众由此产生高通胀预期会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从而加剧经济波动以及对经济健康发展产生更多不利影响^[17]。

另一方面,财政信息过于庞杂时不仅易混淆公众视线,而且还会导致外部监督机制与偏好表达机制的有效性降低,从长期来说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财政对经济社会的正向影响依赖于公众能够科学理解与使用财政信息。在公众的相关能力还不匹配时,政府公开信息过于庞杂导致公众忽视关键信息,财政透明反而成为混淆公众注意力的障碍^[18]。这不仅阻碍财政信息发挥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还会使得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进行有违科学的决策,造成政府行为的扭曲与政府决策的失败,从而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虽然财政透明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即存在“财政透明→经济增长质量”直接作用渠道,但因同时存在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两种作用机制,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大小和方向取决于正负两种效应的对比。

(二)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

1.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作用机制

从理论上,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与负向阻滞两种作用机制。一是 FDI 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首先,FDI 能够促进创新发展。FDI 流入不仅能够为我国本土企业科技水平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带来直接借鉴,而且更高的技术水平、更完善的管理体系与更科学的员工激励机制能够促使本土企业盈利水平上升,为本土企业创新提供经验与资金双重基础。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还能够激发本土创新热情。其次,FDI 能够促进开放发展。人口红利的消失与人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导致廉价生产要素带来的竞争优势难以为继,而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能够促使人力资本、先进技术等转化为我国新的出口竞争优势与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最后,FDI 能够促进共享发展。FDI 不仅能够促进国际交流,通过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促进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大力促进民生事业

的发展、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二是 FDI 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负向阻滞作用。首先,FDI 不利于协调发展,资本的逐利性导致 FDI 倾向于经济发达地区,而 FDI 又会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马太效应”使得地区之间差距不断扩大,有碍协调发展。其次,FDI 不利于绿色发展,处于价值链低端 FDI 流入的目的往往在于利用当地廉价生产要素,通过尽可能压缩成本提高利润水平,因此缺乏节能环保的内在动力,而盈利能力差的 FDI 则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节能减排污染治理,这会加剧当地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不利于绿色发展。除此之外,FDI 会对处于成长期的优质本土企业造成不良的冲击,形成恶性竞争,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并且 FDI 使得地区经济更易于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利于地区经济平稳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虽然 FDI 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即存在“FDI→经济增长质量”直接作用机制,但因同时存在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两种作用机制,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大小和方向取决于正负两种效应的对比。

2.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合作用机制

财政透明除了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之外,还可以通过促进 FDI 流入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一方面,财政透明能够通过提升跨国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促进 FDI 流入。财政透明对地区经济信息的披露能够降低跨国企业在投资经营过程中的调研成本。通过完善居民偏好表达机制能够倒逼地方政府增加民生性投入,从而降低劳动要素成本。通过提升政府履职效率不仅可以抑制财政支出规模的不合理扩张,还能降低企业总体税负。通过促进政府与市场职能的科学划分拉近与跨国企业的制度距离,从而降低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协调成本。另一方面,财政透明能够通过降低跨国企业投资面临的风险促进 FDI 流入。财政透明不仅能够通过促使地方政

府健全法制与优化投资环境,从而更好地维护跨国企业投资经营过程中的正常权益与降低跨国企业投资经营面临的各种不确定风险。亦能通过披露政府公共政策相关信息缓解跨国企业投资经营面临的信息劣势,从而既降低跨国企业投资经营面临的政策风险。财政透明还能通过披露政府信用信息与加强政府面临的舆论压力,从而在提升跨国企业对政府信用判断的准确性的同时加大政府的违约成本,进而降低企业所面临的政府违约风险。

综上所述,财政透明能够从提升外资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与降低跨国企业投资面临的风险两种渠道促进当地 FDI 的流入,但由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存在正向促进与负向阻滞两种作用机制,财政透明通过促进地区 FDI 的流入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造成的间接效应还需视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而确定。当 FDI 对经济增长

质量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正向促进,譬如处于高端产业链的 FDI 的引入会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本土技术革新带来显著促进作用。此时,财政透明通过促进 FDI 的流入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提升的效果。与之相对,当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譬如处于低端产业链 FDI 的引进,会对自然环境与资源造成的严重损害且不利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此时财政透明通过促进 FDI 的流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反而起到了负向抑制效应(见图 1)。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虽然财政透明可以通过促进 FDI 流入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即存在“财政透明→FDI→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且由于财政透明通过促进 FDI 流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间接作用机制同时存在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两种效应,最终的间接影响效应大小和方向取决于正负两种效应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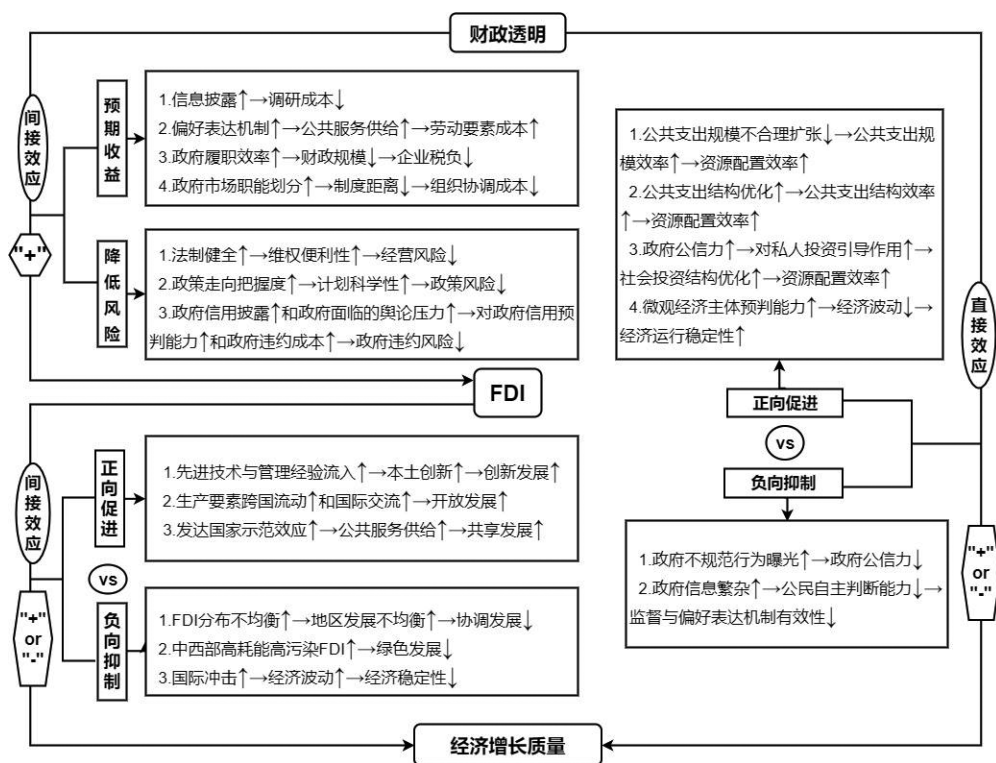


图 1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

三、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一)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质量(economy quality)

本文通过借鉴贺晓宇等(2018)^[19]的研究,将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进行实证回归,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与加入知识投入对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进行改进以及由此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

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Y_{it} = A_{it} L_{it}^{\alpha} K_{it}^{\beta} S_{it}^{\gamma} \quad (1)$$

在式(1)中, Y_{it} 、 L_{it} 、 K_{it} 、 S_{it} 分别表示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知识投入, A_{it} 即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其中, Y_{it} 为各地区实际 GDP(2009 年 = 100), L_{it} 为当年就业人数,资本存量 K_{it} 采用张军(2004)^[20]的方法进行计算,专利存量 S_{it} 采用寇宗来等(2017)^[21]的方法计算得到。

2. 核心解释变量之一:财政透明度(transp)

鉴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每年公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且这一研究报告在国内社会各界的公信力与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本文财政透明度这一指标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每年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2010—2018》。

3. 核心解释变量之二:外商直接投资(fdi)

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额这一指标测度 FDI。具体而言,就是将各地区以万美元为单位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乘以概念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之后,再除以 GDP 平减指数以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最后对其取自然对数。

4.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地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问题,本文依据有关经济理论与已有经验研究,选取如下变量作为实证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一是城镇化率(urban)。该控制变量具体通过计算城镇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得到。

二是资本产出率(capoutput)。该控制变量具体通过计算 GDP 与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得到。

三是老龄化程度(old)。该控制变量具体采用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四是劳动生产率(labeff)。该控制变量具体通过计算实际 GDP 与就业人数的比重得到。

五是工业化率(indsec)。该控制变量具体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六是人力资本水平(caphuman)。该控制变量具体通过计算各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得到。

七是政府治理能力(govability)。该控制变量具体通过借鉴储德银等(2021)^[22]的研究从政府绩效、腐败控制、法治水平和监管质量等四个维度选择二级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回归合成计算得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综合指标值。

八是财政收入分权(fdrev)与财政支出分权(fdexp)。这两个控制变量通过借鉴储德银等(2018)^[23]的经验研究。具体由式(2)和式(3)计算得到:

$$fdrev_{it} = (br_i/pop_i)/(br_i/pop_i + br_c/pop_n) \times (1 - gdp_i/gdp_n) \quad (2)$$

$$fdexp_{it} = (be_i/pop_i)/(be_i/pop_i + be_c/pop_n) \times (1 - gdp_i/gdp_n) \quad (3)$$

九是地方政府竞争(govcomp)。该控制变量通过借鉴缪小林等(2017)^[24]的做法。具体由式(4)计算得到:

$$govcomp = \frac{\text{除本省外相邻省份最高人均 } gdp}{\text{本省人均 } gdp} \times \frac{\text{全国省份最高人均 } gdp}{\text{本省人均 } gdp} \quad (4)$$

十是人口密度(popdensity)。该控制变量的具体计算是利用各省份总人口数除以其土地面积后再取自然对数得到。

十一是劳动力成本(labprice)。该控制变量具体是采用相对工资率来进行测算,即用人均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一方面,西藏和内蒙古有关原始数据缺失严重,且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等原因均未予考虑;另一方面,受限于财政透明度数据的可获得性,所以本文最终的实证样本选取为我国 2009—2017 年间除西藏、内蒙古和港澳台之外 29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其中,除财政透明度之外的所有变量计算涉及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各省份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 EPS 全球统计数据库。与此同时,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coquality</i>	261	1.2714	0.3400	0.6291	2.3771
<i>fdi</i>	261	14.5801	1.6583	9.1851	16.9070
<i>transp</i>	261	0.3144	0.1404	0.1400	0.7770
<i>urban</i>	261	0.5523	0.1316	0.2988	0.8961
<i>capoutput</i>	261	1.7180	0.4214	0.6736	2.7108
<i>old</i>	261	0.0977	0.0199	0.0100	0.1430
<i>labeff</i>	261	5.5003	3.0794	1.4419	16.8473
<i>indsec</i>	261	0.4585	0.0834	0.1901	0.5900
<i>caphuman</i>	261	8.9533	0.9444	6.7639	12.6651
<i>govability</i>	261	0.6451	0.3071	0.0019	1.4649
<i>fdrev</i>	261	0.4810	0.1217	0.289	0.8033
<i>fdexp</i>	261	0.8193	0.0537	0.6782	0.9326
<i>govcompete</i>	261	1.6525	1.2960	0.0343	6.9738
<i>popdensity</i>	261	5.5366	1.2239	2.0433	8.2559
<i>labprice</i>	261	1.1386	1.2481	0.1670	20.2219

四、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 经济计量模型设定

正如前文理论机制部分所述,财政透明度、FDI 和经济增长质量三者之间存在多重作用机制,如若采用单方程方法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易出现内生性问题。现代经济计量理论认为联立方程模型不仅能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而且能分解出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渠道,因而为考察财政透明度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渠道。本文尝试构建如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begin{cases} ecoquality_{it} = \alpha_0 + \alpha_1 fdi_{it} + \alpha_2 transp_{it} + \\ \alpha_3 urban_{it} + \alpha_4 capoutput_{it} + \alpha_5 old_{it} + \alpha_6 labeff_{it} + \\ \alpha_7 indsec_{it} + \alpha_8 caphuman_{it} + \alpha_9 govability_{it} + \varepsilon_{1it} \\ fdi_{it} = \beta_0 + \beta_1 transp_{it} + \beta_2 fdrev_{it} + \beta_3 fdexp_{it} + \\ \beta_4 govcomp_{it} + \beta_5 popdensity_{it} + \beta_6 labprice_{it} + \varepsilon_{2it} \end{cases} \quad (5)$$

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5)中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方程和 FDI 方程。其中,经济增长质量(*ecoquality*)、财政透明度(*trans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为模型的关键变量,其余为控制变量, α 和 β 为待估参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

(二)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结果

根据联立方程识别的秩条件和阶条件可知,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5)中各方程均存在过度识

别问题,因而本文将采用 3SLS 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5)进行估计。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财政透明度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是否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借鉴刘倬奇等(2021)^[16]的做法,选择以 2009—2017 年间各省份人均实际 GDP 均值为划分依据,并采取中位数划分原则将实证样本的 29 个省份进一步划分为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江苏、天津、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湖北、辽宁、重庆、陕西、湖南、新疆、吉林等 15 个省份,而其余省份均为欠发达地区。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三)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1. 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无论在全国层面、发达地区抑或欠发达地区,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影响效应为负,即存在“财政透明 $\uparrow$ →经济增长质量 $\downarrow$ ”这一直接作用渠道,以上实证回归结果已较好证实本文研究假设 1。本文认为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影响效应为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现阶段我国各地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具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并且政府官员总是倾向于隐匿关键信息,这直接导致财政透明无法真正改善上下级政府之间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最终影响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正向促进作用的发挥。二是财政透明对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有赖于一些前提条件,譬如只有在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较为规范的前提下,财政透明才会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又如只有公众具有一定财政基本知识,才能避免公众误解误用财政信息。而我国现实情况是各个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存在许多运行不规范的情况,并且财政国民整体对于财政信息的理解与运用能力较差,此时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影响难以有效发挥。综合以上原因,现阶段我国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向抑制作用超过了其正向促进效应,进而导致财政透明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表 2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方程一			方程二		
	<i>ecoquality</i>			<i>fdi</i>		
	全国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全国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i>fdi</i>	-0.0477 * (-1.66)	0.1479 ** (2.02)	-0.0154 * (-1.82)			
<i>transp</i>	-0.3799 *** (-3.42)	-1.0709 *** (-3.33)	-0.1692 * (-1.95)	0.6357 *** (3.06)	0.6744 ** (2.40)	0.9597 ** (2.05)
<i>urban</i>	0.7178 ** (2.05)	-0.3748 (-0.78)	1.4378 *** (4.60)			
<i>capoutput</i>	0.4972 *** (10.23)	0.3694 *** (4.56)	0.2667 *** (7.94)			
<i>old</i>	-1.3994 * (-1.73)	-2.4867 ** (-2.39)	0.8659 (3.82)			
<i>labeff</i>	0.0000 *** (5.46)	0.0000 *** (5.51)	-0.0000 *** (-3.89)			
<i>indsec</i>	-0.0013 (-0.58)	-0.0182 *** (-3.34)	-0.0019 (-1.63)			
<i>caphuman</i>	-0.1697 *** (-5.88)	-0.2235 *** (-4.05)	-0.1142 *** (-4.92)			
<i>govability</i>	-0.1999 *** (-2.32)	-0.2776 ** (-2.36)	-0.1732 *** (-2.77)			
<i>fdrev</i>				3.1503 *** (6.16)	3.1720 *** (8.25)	7.2616 *** (3.67)
<i>fdexp</i>				-11.4686 *** (-11.62)	-7.5913 *** (-11.76)	-27.1455 *** (-7.78)
<i>govcompete</i>				0.3781 *** (12.11)	0.1739 *** (8.51)	0.8458 *** (11.10)
<i>popdensity</i>				0.0384 (0.83)	-0.0579 * (-1.91)	-0.1667 (-1.18)
<i>labprice</i>				-0.0217 (-0.90)	0.2732 ** (2.54)	-0.0382 (-1.02)
常数项 <i>C</i>	2.2996 *** (6.44)	1.7278 (1.55)	1.5525 *** (8.79)	21.6746 *** (26.45)	19.5912 *** (39.59)	32.6001 *** (11.52)
<i>N</i>	261	135	126	261	135	126
<i>R</i> ²	0.6284	0.6246	0.6478	0.7826	0.7466	0.8326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地区异质性。具体而言,FDI 在全国层面与欠发达地区均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但在发达地区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以上实证回归结果很好地证实了本文研究假设 2,即存在“FDI→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渠道。本文认为在 FDI 与经济增长质量在发达地区呈正向相关关系,而在欠发达地区呈现负向相关关系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欠发达地区的多是吸引旨在利用当地廉价投入要素的传统制造业与工业企业,而发达地区的则有大量是现代服务业以及战略新兴产业,所以在发达地区的 FDI 更能带来先进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技术,促进当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得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创新。因而相比于欠发达地区,FDI 对创新发展

的促进作用在发达地区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在于,欠发达地区 FDI 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要程度要重于发达地区,且发达地区 FDI 往往会选择促进节能减排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污染治理以树立更好的企业形象,这不仅能够挤出资本回报率低的、高耗能高污染的本土企业,也能对本土企业形成示范效应。正因如此,FDI 在发达地区能够促进绿色发展,而在欠发达地区会抑制绿色发展。

3. 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但基本符合预期。一是城镇化率在欠发达地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但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不显著。二是资本产出率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三是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在发达地区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

提升,而在欠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四是劳动生产率在发达地区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在欠发达地区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五是工业化在发达地区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在欠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六是人力资本水平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均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本文认为原因或许在于人力资本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天然倾向会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并且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现阶段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或是由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非线性效应,只有当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到一定水平才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目前我国各省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

(四) 财政透明对 FDI 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1. 财政透明对 FDI 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可知,无论是在发达地区抑或欠发达地区以及全国层面,财政透明与 FDI 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一实证回归结果很好地佐证了本文研究假设 3,即存在“财政透明 $\uparrow$ →FDI $\uparrow$ ”的作用渠道。一是财政透明能为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提供其所需要的决策信息。一方面,通过提供宏观经济运行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信息等降低企业市场调研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公共政策信息减少企业所面临的政策风险,确保跨国企业能将其投资收益顺利汇回母国,从而吸引更多的 FDI 流入。二是财政透明有利于完善和健全公民利益偏好表达机制,促使辖区政府民生性投入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用脚投票”机制说明公共服务改善后的辖区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与消费者集聚,从而在为跨国企业投资经营间接降低人力资本成本的同时,还能为其拓宽市场,因而从而能够吸引到更多的 FDI。三是财政透明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加强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通用完善外部监督机制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腐败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树

立更具公信力的地方政府形象以增强跨国企业投资信心;另一方面,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使得地方政府具备充足的财力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其吸引 FDI 流入的能力。四是财政透明对应着更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更公平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更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政治环境,能够保证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经营时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维护其合法权益,在东道国更稳健地经营与获利,从而有助于地区提升其对 FDI 的吸引力。

2. 其他控制变量对 FDI 的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对 FDI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但基本符合预期。一是财政收入分权会促进 FDI 流入,而财政支出分权会抑制 FDI 流入。二是地方政府竞争对 FDI 流入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三是人口密度在发达地区对 FDI 流入会产生负向抑制作用,而在欠发达地区则不显著。四是劳动力成本在发达地区对 FDI 流入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在欠发达地区则不显著。

五、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识别与传导效应比较

(一)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识别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比较传导效应大小,本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5)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即对各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后再次采用 3SLS 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鉴于标准化回归结果系数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故对标准化回归结果不再展开分析。

(二)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识别和传导效应比较

为准确识别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传导效应大小进行比较,本文在表 3 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得到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以及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3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方程一			方程二		
	<i>ecoquality</i>			<i>fdi</i>		
	全国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全国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i>fdi</i>	-0.1407 * (-1.66)	0.1927 ** (2.02)	-0.1710 * (-1.82)			
<i>transp</i>	-0.1569 *** (-3.42)	-0.2254 *** (-3.33)	-0.1523 * (-1.95)	0.0891 *** (3.06)	0.1089 ** (2.40)	0.0778 ** (2.05)
<i>urban</i>	0.2779 ** (2.05)	-0.1427 (-0.78)	0.5940 *** (4.60)			
<i>capoutput</i>	0.6162 *** (10.23)	0.4395 *** (4.56)	0.6040 *** (7.94)			
<i>old</i>	-0.0818 * (-1.73)	-0.1355 ** (-2.39)	0.0990 (1.36)			
<i>labeff</i>	0.6446 *** (5.46)	0.8885 *** (5.51)	-0.4572 *** (-3.89)			
<i>indsec</i>	-0.0315 (-0.58)	-0.4289 *** (-3.34)	-0.1020 (-1.63)			
<i>caphuman</i>	-0.4714 *** (-5.88)	-0.6003 *** (-4.05)	-0.4612 *** (-4.92)			
<i>govability</i>	-0.1805 *** (-2.32)	-0.2372 ** (-2.36)	-0.2630 *** (-2.77)			
<i>fdrev</i>				0.3827 *** (6.16)	0.8593 *** (8.25)	0.2657 *** (3.67)
<i>fdexp</i>				-0.6142 *** (-11.62)	-0.9166 *** (-11.76)	-0.8120 *** (-7.78)
<i>govcompete</i>				0.4890 *** (12.11)	0.5324 *** (8.51)	0.4987 *** (11.10)
<i>popdensity</i>				0.0469 (0.83)	-0.1532 * (-1.91)	-0.0992 (-1.18)
<i>labprice</i>				-0.0270 (-0.90)	0.1374 ** (2.54)	-0.0378 (-1.02)
常数项 <i>C</i>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0.00)
<i>N</i>	261	135	126	261	135	126
<i>R</i> ²	0.6284	0.6246	0.6478	0.7826	0.7466	0.8326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4 财政透明与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渠道与效应传导

样本范围	作用渠道	效应测算	测算结果	总效应
全国样本	FDI→经济增长质量	α_1	-0.1407	-0.1407
	财政透明→经济增长质量	α_2	-0.1569	-0.1694
	财政透明→FDI→经济增长质量	$\beta_1 \times \alpha_1$	-0.0125	($\alpha_2 + \beta_1 \times \alpha_1$)
发达地区	FDI→经济增长质量	α_1	0.1927	0.1927
	财政透明→经济增长质量	α_2	-0.2254	-0.2044
	财政透明→FDI→经济增长质量	$\beta_1 \times \alpha_1$	0.0210	($\alpha_2 + \beta_1 \times \alpha_1$)
欠发达地区	FDI→经济增长质量	α_1	-0.1710	-0.1710
	财政透明→经济增长质量	α_2	-0.1523	-0.1656
	财政透明→FDI→经济增长质量	$\beta_1 \times \alpha_1$	-0.0133	($\alpha_2 + \beta_1 \times \alpha_1$)

1. 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效应

依据表 4 计算结果可知,无论是在全国层面抑或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均同时存在“财政透明→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作用机制和“财政透明→FDI→经济增长质量”的间接作用机制,但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地区异质性。一是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

别为 -0.1569、-0.0125 和 -0.1694,即财政透明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二是从发达地区来看,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为 -0.2254、0.0210 和 -0.2044,即财政透明会直接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通过吸引地区 FDI 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三是从欠发达地区来看,财政透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为 -0.1523、

-0.0133和-0.1656,即财政透明不论通过直接途径抑或间接途径均对经济增长质量形成负向抑制作用。

2.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效应

依据表4计算结果可知,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一是在全国层面与欠发达地区,FDI对经济增长质量呈负向抑制作用,具体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1407与-0.1710。二是在发达地区,FDI能够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体的影响效应为0.1927。根据前文理论部分的分析,这一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吸引的FDI的质量不同所导致的。正因如此,新时代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还需要对FDI的质量有所筛选与优化FDI结构。综上可知,财政透明与FDI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标准化回归估计结果较好地验证了研究假设1—假设3。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财政透明作为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内在诉求与制度基础,不仅能够通过促进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行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亦能通过优化外来投资者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增强地方政府对于FDI的吸引力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理论诠释与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一方面,财政透明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还可以通过促进FDI流入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FDI在发达地区能显著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在欠发达地区反而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产生抑制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通过加大财政信息公开规范与约束地方政府收支行为,从而长期推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为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与不断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一方面,要通过加大财政信息公开构建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规范机制;另一方面,为避免由于各种非规范政府收支“乱象”贸然公开

曝光而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以及加剧经济波动等负面影响,财政信息的公开也不能一蹴而就,应将规范地方政府收支与财政信息公开同步推进,从自我约束与不断倒逼两个维度促进政府收支行为规范化,进而通过“全面规范”与“公开透明”切实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二是要加强财政信息公开制度与平台建设,以及对财政信息的官方解读,从而尽可能地保证财政信息公开的全面性、及时性、真实性与有效性。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民众更加科学准确地理解财政信息,更好地行使其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偏好表达权与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权,促进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职能的履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帮助外国投资者克服“外来者劣势”与优化营商环境,在提升其预期收益的同时降低其面临的各项风险,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优化FDI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在进一步扩大FDI规模的同时,还需考虑FDI流入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地方政府应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特征与资源禀赋,有的放矢地扩大FDI的引进规模。其中,发达地区应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通过引进更多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欠发达地区应对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项目进行严格控制,阻止发达国家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落后产业转移至我国内地,而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OL]. (2017-10-18) [2017-10-27].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EB/OL]. (2018-02-28) [2018-03-21].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21/content_5276191.htm#1.
- [3] 斯蒂格利茨. 公共财政[M]. 纪沫, 严森, 陈工文, 译.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 443-464.

- [4] KOPITS M G, CRAIG M J D.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operations [R]. IMF occasional paper, 1998.
- [5] KOLSTAD I, WIIG A. Is transparency the key to reducing corruption in resource-rich countrie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3): 521-532.
- [6] ALT J E, LASSEN D 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corruption in American states [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03, 15(3): 341-365.
- [7] DE SIMONE E, GAETA G, MOURAO P. The impact of fiscal transparency on corru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longitudinal data [J].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17, 17(4): 1-17.
- [8] GRAAF G. Causes of corruption: towards a contextual theory of corruption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7(31): 39-86.
- [9] ALT J E, LASSEN D D. Fiscal transparency,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bt in OECD countries [J]. 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 2006, 50(6): 1403-1439.
- [10] MONTES G C, BASTOS J C A, DE OLIVERIA A J. Fiscal transparency,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efficiency: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based on panel data approach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9(79): 211-225.
- [11] LORENZO C, ELINA D S, SALVATORE 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scal transparency on FDI inflows [J].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2020, 73(2): 1-10.
- [12] KAUFMAN D, KRAAY A. Growth without governance [R]. 2002.
- [13] ARBATLI E, ESCOLANO J. Fiscal transparency, fiscal performance and credit ratings [J]. Fiscal studies, 2015, 36(2): 237-270.
- [14] 张树剑. 地方治理、财政透明与经济增长——1985—2013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世界经济文汇, 2016(5): 109-120.
- [15] ALT J E, LOWRY R C.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empirical results for US states [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10, 22(4): 379-406.
- [16] 刘俸奇, 储德银, 姜春娜. 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J]. 经济学动态, 2021(4): 107-123.
- [17] GABRIEL C M, LUIZA C L. Effects of fiscal transparency on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8, 70(6): 26-37.
- [18] HEALD D. Surmounting obstacles to fiscal transparency [R]. 2015.
- [19] 贺晓宇, 沈坤荣. 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 上海经济研究, 2018(6): 25-34.
- [20]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 35-44.
- [21] 寇宗来, 刘学悦, 刘瑾. 产业政策导致了产能过剩吗? ——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9(5): 148-161.
- [22] 储德银, 费冒盛.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治理[J]. 财贸经济, 2021, 42(2): 51-66.
- [23] 储德银, 韩一多, 张同斌, 等. 中国式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线性抑或倒“U”[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3): 1259-1288.
- [24] 缪小林, 王婷, 高跃光. 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分组比较[J]. 经济研究, 2017, 52(2): 52-66.

(本文责编:辛 城)